

其內部陳設，更不能瞧，一付破落景象，如果有人請我競選臺中市長，先看它那個樣子，就真不想坐那「寶座」哩！

噴水池有什麼好看

市府前的那座噴水池，看起來有點笨笨的樣子，這也許是因為它嫌大了一些，池壁嫌厚了一些。而那噴水部潰出來的「水柱」比三歲小孩的小便粗不到那裡去，立見寒酸之相，更談不上美觀與氣派了。

臺中公園那一座也犯了同一的毛病，我真不知道何以許多人在未考慮到「水壓」的問題前，還那麼熱衷於噴水池的建造？老實說以那樣細的「水柱」，怎會美得起來？造一座噴水池，除了池子本身的建造外，如果不就加強水壓的問題作一完美的附屬設計以及長遠的打算，有不如無，像電影上常見的那些美麗噴泉，豈是我們這般小兒科所能選得出的？所以與其這個寒酸相的噴水池，還不如就請員林的那位玫瑰大王——張慕祥先生來設計一個玫瑰花圃來得實際些。

最近才完成的那一座位於車站廣場的噴水池，比起以上兩座來，要算是較令人滿意的匠心之作，雖其「水柱」之細依然不改，不過它一下子弄上好幾十條水柱，就顯得有點可觀了，只可惜我們小兒科的毛病一時仍改不了，那些用作噴嘴的鐵管，偏偏又是極易生鏽的東西，不過幾個月下來，噴水口已有大有小，使得噴出來的水柱，有細有粗，有做分叉狀，有做扁平狀，參差不齊，破壞了整體的美，如能預先採用不鏽鋼之類，豈不理想？

女性建築

臺中的首輪電影院要算東海最新最好，雖然比不得臺北的幾家大戲院，但也算是很够標準的了，不過它的內部設計和外部結構還予人以不成熟與有欠穩重的感覺，與此相較，另一家森玉戲院就好多了，只可惜它也是小型的。此外如豐中戲院和中東戲院等自經改裝以來，已經換然一新了，尤其是豐中戲院的內部設計，別有一番苗頭。至於臺中和成功兩家，又老又舊，早就該改建了。

值得一提的是東海和豐中的內部佈置都是出於同一位王姓設計師之手，此公原不是建築師出身，但却對造型和色調的配置，特具異稟，臺中的幾家著名咖啡廳都是他的傑作，其中南夜尤其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優點是善於陳設和組合各種零碎的圖象，造型極為活潑，色調尤為鮮艷，予人以柔

和的美感，但是他似乎是較宜於咖啡廳，戲院一類的設計，這一點可以從南夜的外型設計上明顯地看出來，最近在森玉戲院對面正大興土木的那一家咖啡廳，看樣子又是他的傑作，從掛在路邊的那一張透視圖上看似乎又勝南夜一籌，但是他的設計畢竟都是屬於「女性的」，大建築當非其所長。而美國式的那種「男性的」粗線條的豪邁的建築風格則非區區臺中所得一見。

廁所建築

就看那幾座陸續完成的所謂「××大樓」吧！大則大矣，高則高矣！却是難得叫人肅然起敬的。譬如東海大樓和綜合大樓，它們都顯得太缺少「曲線」些，其正面平得像「飛機場」，毫無動人的「成熟風韻」，剛建成不久的合作大樓則又顯得瓷磚的顏色似太濃了些。

提到瓷磚就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臺灣目前的建築界正被這一股歪風吹得一踏胡塗，人家外國是拿來貼廁所的，我們却拼命拿來貼花臉，我不是反對瓷磚，但你若能貼得像那座高聳的電信大樓一樣高級倒也罷了，却不幸貼得儘是像中山路和平街交界處的那一庭，好不令人惡心也。怪不得我們的建築要被外人譏為「廁所建築」了，真是奇恥大辱者。

最後再讓我回來談談本學院的建築。憑良心說，我們的校舍不能不算考究，最低限度地板還都是磨石的，但最可惜的是它缺少其所以是中國醫藥學院的那種特異「風格」，如果一所建築物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甚至是到處可以有此相似的建築，那就完了。看東海大學的那一座「魯斯紀念教堂」最是具有獨特風格的表帥，因為全世界僅此一家，別無分號也。所幸我們的庭園設計還不太差，置身其中，實多輕鬆愉快之感。

幹建築這一行似乎是世間少有最令人寫意的行業了，因為他們花別人的錢，塑造自己的美麗作品，只可惜時下一般出錢的老板們，他們的欣賞力多不高明，他們捨得花大錢買一些難看的建築材料，却捨不得多花些小錢請一位高明一點的建築師，這實在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奉勸各位，將來如果行有餘力，準備大興土木千萬得請一位好建築師，並即委以全部信任，讓建築師完美的意象得以充分發揮，則您將不難獲得一所像「傷風克」林老板的住宅一樣的「黃宮」住了。

↑ 著者認為應該由中國文化學院來辦學，因為中國文化學院的學生多為中國人，中國人自己來辦學，才能保證中國文化得到傳承。

↑ 著者認為應該由中國文化學院來辦學，因為中國人自己來辦學，才能保證中國文化得到傳承。

「藥學年會」有感

思良

臺灣光復以來，由於經濟繁榮及社會安定，促使各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在這些進步當中，最令人欣慰的莫過於學術研究的風氣日盛一日。我們常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學術論作的發表，以及各種學術年會的舉行，中國藥學會暨臺灣省分會年會即屬此性質的學術團體之一。

五十四年度藥學會年會，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假臺大醫學院禮堂召開。（目前中國藥學會及臺灣省分會的年會係合併舉行）。本屆大會由總會理事長孫雲燦博士暨省分會理事長許鴻源博士分別主持。典禮簡單而隆重，雖然會場外沒有廠商引人入勝的摸彩，供免費試用的多采多姿的藥品，以及儀器展覽；場內也缺少高級長官蒞臨指導，然而會議的進行既輕鬆且愉快。大會中除會務報告外，尚研討藥局管理、衛生檢驗及修改會章等事項。之後，並邀請日本九州大學藥學部部長塚元久雄博士及我國名生藥學家那琦博士特別演講。這位享譽國際的藥品體內吸收權威學者——塚元久雄博士講題是「藥物之代謝與毒性」。他說：「要理解藥物之毒性，須先知道該藥物在生物體內之代謝。換言之，沒有藥物代謝之知識，不能論及藥物之毒性。」「藥物代謝的研究對醫藥品、食品添加物、農藥、及化粧品等之創造有莫大幫助……」等理論，深獲與會人士的贊賞。塚元久雄博士同時亦以日本國藥學界代表的身份前來祝賀我國藥學會的盛典。那琦博士乃以他去年三月榮獲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的研究論文：「臺灣產山藥之生藥學研究」為講題。那博士從事於臺灣省產山藥之調查研究已有七年之久，常赴本省南部、中部及東部各山地採集山藥原植物，並調查山藥加工工廠、山產行、訪問中藥店，數年辛苦始獲完成此一研究。我們都知道那博士曾任本學院首屆藥學系主任。以往學院在風雨交加中，他領導本學院藥學系同學，不受外界的影響，培育這棵幼苗成長與壯大。可惜學院太多的波動促使他

身退了，如今他為臺北醫學院專任教授，偶爾回本學院兼課。我們一直認為院方未能將好的教授想辦法聘為專任是一件遺憾的事。

年會中最主要的就是論文宣讀；顯然地，此仍是藥學界同仁一年來研究心得的報告。本屆論文的提出計有三十七篇；分別由臺灣省衛生試驗所、臺灣必治妥研究所、臺大藥學系、高醫藥學系、北醫藥學系、國防醫學院藥學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東南製藥廠等單位所提出。我們總覺得歷年來，本學院在這方面的表現未免過於「禮讓」和「謙虛」！因為本學院努力了七、八年的：「中西醫藥一元化、固有醫藥科學化」目標，至今却未見些許顯然的成果，相反地，我們應該做，而且我們也能做的工作，如今還是拱手讓人，我想這是本學院一切都在欣欣向榮，邁向前程中，一件足以使我們感到顧慮、傷心而極需「後來居上」的事。會後筆者曾私下訪問一位與會且在本學院兼課的某位教授，懇求他能給予同學們這方面的指導，可是他以為：研究工作是需要經費的維持和專家的指導下方能進行，否則單靠個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所以我們希望學院能重視研究的設備，同時禮聘專任教授。否則一個學院倘使僅對外界顯耀一學期能節省多少開支，相反地在研究方面鮮有成就，我想學生們亦不會感到太多的光榮。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希望明年度的年會，我們的系主任和教授們也能像其他學院一樣，率領我們的同學在年會上傲然地宣讀我們一年來的研究成果，不要模仿過去秘而不宣，讓人們也曉得我們具有「秘方公開」的雅量。

其次讓我們來談談「藥學會」這個團體的組織。「藥學會」的雛形始於民國初年，當時藥學界的人士曾有中華藥學會的組織，它和中國醫學會相似，均為學術研究團體。及至抗戰開始，社會秩序慘遭破壞，政府規定人民團體必須重新登記，中華藥

學會那時未能在限期內辦妥手續，遂被政府取消。直至民國三十年十月，當時從事於藥學的同仁，有鑑於科學日新月異以及發展藥學的重要性，乃決定將中華藥學會改組，次年，始於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成立，且向政府重新申請登記，並更名為中國藥學會，各省均設分會。中國藥學會臺灣省分會則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日成立，是年五月十六、七兩日在南京國立藥專召開中國藥學會第四次年會時，臺灣省派有代表盧茂川、張國周、許鴻源、葉啓明等前往參加，三十八年神州沉淪，中國藥學會隨同政府東移，在臺經呈請內政部核准復會至今。本年度的年會係第十七屆。承蒙中國藥學會暨臺灣省分會的邀請，本學院藥學系應屆畢業班同學推派王文通、黃文雄、張洋捷、陳田及筆者等五位代表參加。

藥學會在性質上不同於藥劑師公會；藥學會是一種學術團體，而非職業團體；藥師在執行業務時，必須加入藥劑師公會，但取得藥劑師資格，而未執業者，可以不必加入藥劑師公會；藥學會則可自由加入。依據中國藥學會章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凡國內外藥學專科院校畢業者或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有關學院科系畢業從事藥學研究有成績者均得為本會會員。同條第三項規定：高級藥劑職業學校畢業及現在藥學專科或藥學院三、四年級肄業者屬於預備會員。預備會員除了無「被選舉權」外，其他應享的權利和義務皆與會員相同。質言之：包括研究自然科學，從事於藥學研究工作者均可加入。此外尚有名譽會員及團體會員，至本年度為止，藥學會的會員計有八百人之多。目前，據我們所知本學院在校藥學系同學尚無加入者，已申請入會者有三名，對於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可申請加入。

藥學會——我們都知道是藥學同仁共同研究藥學學術、交換研究心得，藉以推展藥學事業的一種組織，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除了於年會上發表外，均隨集呈現在藥學雜誌上。「臺灣藥學雜誌」——自創刊迄今，已進入第十六卷了，以往的十五卷中，藥學會同仁已發表的論文，計有原著三十篇、資料五十篇。論文中有關植物成分二十三篇、藥物化學十八篇、生藥學二十三篇、細菌學十一篇、製劑學十篇、衛生食品十篇、藥用植物栽培四篇、有關藥理二篇、其他四篇。資料五十篇中，有關藥用植物學九篇、藥品製造八篇、食品品質十六篇、教育及公共衛生八篇、其他五篇；由上述的統計，我們得知藥學界人士近幾年來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之不豐。「臺灣藥學雜誌」乃免費贈送給藥學會全體會員、有關機關和圖書館等。

時代愈進步，國與國之間的距離益形縮短，國際關係益形密切。藥學會在國際學術交流及聯繫方面，這些年來亦有相當的成就，諸如民國四十七年重新加入國際藥學會，四十九年藥學會推派顧文儀

教授，前往丹麥哥本哈根參加該年國際藥學會年會，五十三年在荷蘭舉行的國際藥學會年會，由孫雲齋理事長出席參加，最近組織的亞洲藥學聯盟亦應邀加入為會員，還有每年年會均邀請國際藥學知名人士前來特別演講；從四十六年至今計有十八位博士教授應邀，國內博士教授應邀者亦有三位。於平時，藥學會亦不斷聘請國際藥學專家來臺講學。同時對於外國學者來臺從事藥學研究者及國內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學校或藥廠有關藥學與藥業、藥政、製藥等問題，均提供意見及給予最大的協助。揆諸上述事實，都足以表示我國藥學同仁為提高國內藥學學術水準與國際藥學界密切合作，為謀求人類之福祉所作的努力。

雖然藥學界人士，經常都在埋首苦幹，潛心研究藥品，對於人羣與社會有着莫大的貢獻，然而在我們的社會裡，並未能引起各界普遍地重視。就以藥學會每年召開年會的情形而言，醫藥界很少自動參加捧場的，不若醫學年會之召開，有各藥廠、儀器行參加展覽，並行招待，這固然是為了廣告和生意，無可厚非。更遺憾的是某些醫學院尚不同意他們學院藥學系的同學前往參加。導致這種結果的成因，我們不難由幾方面覺察：一、藥學系在臺灣各大專院校的設立遠較醫科為遲，因此藥學界人才也較醫學界為少。二、藥師與醫師的工作不同，醫師站在人前服務，得失容易被人發現。藥師站在人後工作，雖對社會貢獻很大，亦難被人發現，大都成為無名英雄。三、一般人認為藥師祇是醫師的助手，醫師的看病重於藥師的配藥，且以為藥品只要拿錢就可以買到。其實藥品並非完全是商品，沒有好的藥學人才，研究好的藥品，拿錢也買不到好藥，以今日的癌症來說，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因此外國對於藥學極為重視，醫與藥分開齊頭並進。唯獨類似日本醫藥體系的亞洲少數地區才有醫師連帶配方，賣藥這種職份劃分不清的現象！

社會問題的癥結往往可以從學校裡發現；藥學同仁在社會上的地位彷彿藥科同學在醫學院的處境一般。現今臺灣大多數的藥學系均附屬於醫學院，一般在教學設備上遠不如醫科，更妙的莫過於藥學系轉醫科尚須藥捐一筆鉅款，無形中將醫和藥之間造成了身價的差別，使得純潔的學子在心靈上產生：「學術有上下」的觀念。社會的觀點既然如此，自然一時也無法改變得了。但願藥學系同學不要因此灰心，更無須自悲。相反地，我們需要堅強地站起來面對現實，認清我們的職責。試想一位醫師一生當中最多只能為幾萬人服務，可是一位藥學研究者發現一種新藥或服務於藥廠的藥師一生所製造的藥品，不知能為幾百萬或幾千萬人服務。倘使我們都能有如是見解，藥師在社會上是足以引為自豪的。因此，我想我們所要爭取的是服務人群的機會與權利，而非社會上的名譽與利益。願我藥學系同學共勉之！

我的名字叫 莎士比亞

威廉·莎士比亞著
蝦仔譯

因我叫莎士比亞，我一生遂成了被取笑的對象。所有遇上我的人，似乎總是帶著幽默或者訓誡的口吻開我的玩笑。說實在的，並不是因被取笑而使我感到煩惱，而是取笑者他們那平俗而缺乏新奇材料的笑話使我感到十分的苦惱。

小時候當我能了解第一個問題時，我的長輩們微笑帶着勉勵的眼光對我說道：「孩子，你有這麼個顯赫的名字，你是否與那大文豪莎氏有親屬關係呢？」入學以後，老師時常如此訓勉我，「任何人有你這顯赫的名字定會對你所繳上的功課感到羞澀的。」我並不懷恨老師不斷地使用這句話，相反地，因有了它而使我加倍的勤奮求學。

除了為被取笑的對象之外，有些意外事件更使我終身難以忘懷，因為它捉弄了我的命運。

第一次的意外事件發生於一九一七年一個星期日下午，當我坐在紐約 Freeville 車站辦公室時，突然從售票窗上傳來一陣激震叩敲聲，我打開門一看發現是這鎮上的一位女教員，她立刻要一張

赴紐約的車票。而我解釋說：「因售票員不在你必須等到他五點鐘回來時才能買到車票」。她一聽之後大發雷霆並且說道：「人們從未如此不禮貌地對待過我，我一定要你們鐵路局長聽聽你這一道。」然後問道：「年青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我意識到大災禍臨了頭，可是又不可不回答，只好老實地回答了她。然而她愈加忿怒。是否我試想把她當作傻瓜呢？鐵路局曉得他們僱用了一位喜於愚弄顧客的年青人嗎？真的，她的確告到局長辦公室，二個星期內我失去在車站裡的職位，並且被呼喚到懲誠委員會前說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為了滿足顧客永遠是對的與討好顧客，我不得不犧牲地調去另一部門，然而這次的笑柄總是去之不掉，奈何。

另一次使我在有生之日永遠不能或忘的。一九三一年我住院於 MOUNT ALTO VETERANS HOSPITAL。我及許多患者被邀請參加總統一年一度在白宮草地所舉行的集會 (LAWN SOCIAL)。場合異常融洽，海軍樂隊及不少高級官員也在場。在會見總統之前，我心情非常愉快。這也就是說，謁見總統時先把每個人的名字給予一位站於總統身旁的陸軍少校，然後再由他轉遞予胡佛總統 (THE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後來輪到我了，當時我毫無意識給了我的名字，這位武官臉上表情驟然為之一變——由微笑變為一種古怪的驚愕，他向一位便衣護衛打了一個暗示，我的天啊！他們以為我頭腦不清楚，將對總統有怎樣不利的行動。我還是仍然被介紹給了胡佛總統，當時他的臉上表情也為之一變——由一副問候的微笑轉變成一副同情的微笑——以為我住院的關係而精神有點不對勁。後來，我經過總統座位時無意中聽他對一位海軍副官說：「的確，這裡有些患者非常可憐！」

又一次，我打了長途電話詢問股票情形。談了六分鐘後，我決定先給以定購，因此給對方經紀人地址和姓名。對方以為我說錯了要求再重覆一次。這下可不得了，就如我事先恐怕發生一樣，從電話筒中傳來一陣怒言：「先生！聽着，我沒有時間跟你開玩笑，我太忙了。」然後一聲「碰」把電話掛掉，留下來的是什麼？——張美金五元五角的電話帳單。

在這種受姓名之累的情況下，雖然每天背負着這種痛苦，但我仍企圖笑一笑。在我的内心裡，我是多麼地希望父母親當時不取我這名字——莎士比亞。